

要加大力度。对于文昌文化重要的文献,要进行重点的研究。目前这一工作有非常大的突破。但是,分歧和学术争议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对这一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来做基础性的工作。其二,对文昌文化的来源、传播路径、传播者及受众等要做细致的研究,不可笼统。在诸多的研究工作中,问题最多的,是对于一些含混之处,不能够下功夫去探究其真实面目,而是人云亦云。其三,文昌文化的社会影响。文昌文化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古老文化,在其流传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神格和执掌,在同社会的互动中,对于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满足了信众怎样的需求,这是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如研究者基本认为文昌帝君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以执掌文衡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大量的资料显示士子无论是考前的祈神庇佑还是考后的预卜吉凶,文昌帝君并不是唯一的祈祷问卜对象,而同时又有很多的其它神祇在担任这种角色,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其四,文昌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怎样使古老的文昌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发挥新的作用,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应思索的问题。传统道德的重建中,文昌文化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文昌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加强人们的道德反省,但这是一种神诚性的道德,它规定了每一种行为的道德属性,并且人时刻处于神的监察之下,由神来赏善罚恶,以此来维持道德的法则。那么,在弘扬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提倡是可行的吗?如果放弃了这一神诚性的特色,那么,文昌文化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又有怎样的区别呢?这些都是在思考文昌文化对现代社会意义的同时产生的问题。

“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凤阳召开

由中国明史学会与凤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9年10月30—31日在凤阳县召开。上午,南炳文教授致开幕词,王世华教授讲话,又有9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报告,下午则分三组展开了认真而热烈的研讨。

在这次会议上,有10多位专家学者提出10多篇文章,分别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文物考古学、家族谱牒学、语言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朱元璋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展开讨论,成为这次会议的亮点。这些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比较统一,对朱元璋的出生地在凤阳没有分歧。其中,陈梧桐认为凤阳说即“钟离之东乡”说,不仅以朱元璋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表述为依据,而且有许多旁证,因而为官方编撰的实录、正史和私家撰写的绝大部分史书所采纳;盱眙说出现于朱元璋去世之后,依据的是民间流行的“圣瑞”传闻,不仅荒诞无稽,而且各种传说彼此牴牾,漏洞百出。刘思祥利用正史、笔记、方志、谱牒、传说等,结合实地考察,认为元末的钟离东乡就在今凤阳,朱元璋就出生在今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明代为临淮县感应乡燃灯集金桥坎)。吴仁安用大量的史实论证“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反映了历史事实,故朱元璋出生地其它另类说法可以休矣”!夏玉润在考述了“凤阳”、“盱眙”二说

的始末后,认为朱元璋在世时,只有“凤阳”一说。永乐以后,围绕朱元璋出生前后所发生的“圣瑞”之象,在以讹传讹的过程中,泗州盱眙地方官采用编纂地方志等方式,将这些“圣瑞”之象拉入盱眙县,从而产生“盱眙说”。他又对盱眙县“明光”地名的产生和变更作了考证,认为明中叶以后,泗州盱眙官员为了争夺朱元璋的出生地,将李文忠出生时所发生的奇异现象移至朱元璋身上,并将李文忠的风水山“斗光山”改名为“明光山”,从而将朱元璋的出生地移至“灵迹乡”。

学界之所以对朱元璋出生地产生分歧,主要是所用史料不同所致。高寿仙提出应以朱元璋自述史料为主。陈怀仁也以为应以朱元璋本人述说为主。卞利提出应以当事人的陈述和最早文献记载为依据,同时又提出应与元代史料结合起来用。王世华认为研究一个人的出生地,只有两种材料可信:一、本人的说法,只要这种说法不涉及到本人利益的话,这应是最有力的证据;二、如果本人没有说法存世,那么离该人时间最近、与该人关系最亲,例如他的父母、兄弟、儿辈、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应是可信的。同时,他又提出史学研究中史料应注意求真、实事求是,传说不能当信史。

本次学术讨论会还深入研讨了凤阳与朱元璋以及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和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南炳文以为朱元璋的祭祖活动是他追慕先祖的情感宣泄。方志远认为明太祖从一个破坏者迅速转化为一个建设者,从一个草莽英雄很快变为一个法制专家。朱亚非认为朱元璋是将法制和礼教有机结合在一起加以使用的,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林金树认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多元土地政策,大力兴农;为权力也为责任,征税于农;用国家救助体系,减税济农。周致元认为朱元璋的荒政建设具有开创性。周喜峰认为朱元璋的“华夷之辨”与“华夷一家”的思想,使朱元璋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针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法国滨海大学副教授马骊博士则借鉴政治学理论研究朱元璋,认为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布衣皇帝。此外,章宏伟对明代杭州私人出版作了考察,指出对明代杭州私人出版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刘明杉论述了洪武时期景德镇“陶厂”贡瓷的生产状况、规模及性质,洪武时期皇家祭瓷的使用及品种等。李小林对明代光禄寺的职能与管理作了探讨。胡凡对明代宪、孝、武三朝在河套修筑长城的历史作了考察。张海英则对洪武年间因地域而引发的朝内政治斗争作了研究。与会的专家学者各陈己见,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作大会学术总结,提出研究历史要坚持三个原则: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排除功利性;二要坚持历史进步原则,冷静、理性,严禁把个人感情掺杂其中;三要坚持先贤研究成果,不要随意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推翻已确立的历史上久经考验的结论。

11月1日,与会的部分代表又考察了朱元璋出生地。朱元璋自叙出生于“钟离之东乡”,关于“东乡”的来历,安徽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思祥考证:东乡为元代乡级建置,到明代改为感应乡,元代的“东乡”可能由西汉东乡县改置,该遗址在今凤阳县东南六十里,原属梅市乡,梅市乡并入红心镇后,改属红心镇。代表们先考察了红心镇大宇村邻近的瓦屋夏村,在这里走访了年逾八十的夏家林、夏国庆老人,以及瓦屋夏小学校长夏家伦。老人的回忆及该地区地表遗物证明,清代相关方志中记载的这里是古“东乡城遗址”并非毫无根据。由此可以断定,朱元

璋自叙的“钟离之东乡”不能认定在今明光市境内。之后,代表们又参观考察了金桥坎,即今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走访了金桥村村民刘宝朝家,阅读了刘氏宗谱,听村民们讲了这里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及传说,这些传说与地方志记载结合起来,使朱元璋出生地有了清晰、可信的现实依据。接着,代表们又参观了金桥水库,由水库地层结构想到朱元璋搓泥块变成黄鳝、泥鳅造成库坝漏水的传说,使传说故事与客观现实有了可信的因果联系,增加了朱元璋传说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陈梧桐对这次考察非常满意,认为通过这些故事和实物,可以断定东乡在今凤阳县境内,明代隶属于感应乡的金桥坎就是朱元璋的出生地。

这次会议,得到与会代表的齐声称赞,认为这是近年来明史界少有的盛会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李成燕)

《汉晋家族研究》评介

孙立群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071)

《汉晋家族研究》(阎爱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出版,对汉晋时期的家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做了富有新意的学术探索。

首先,该书是对汉晋家族及其变迁的一次比较系统和细致的研究。《汉晋家族研究》全书共35万字,除绪论外分为八章:婚姻方式的嬗变、亲属结构的轻重、亲属称谓的变化、祖先祭祀与丧服制度、家、族结构和规模、家长权与族权、继嗣制与血亲的拟制、家族观念与社会风尚。书中所涉内容,有的学界研究已然较为充分,有的属边缘学科范畴,作者将其精心统筹安排为系统的内容来考察,使读者对汉晋家族本身的形态、制度以及其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另外,从关联和整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会带来新的发现和深化已有认识。

如从亲属结构和皇室婚姻方式角度分析汉代外戚干政现象;由婚姻方式演变看魏晋门第婚的作用,它还有克服原始婚俗的积极意义;以宗族共有经济过渡形式论述士族的捐资义举和荫族特权,对魏晋士族的特质会有更合理的解释。

其次,揭示了汉晋社会是家族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本书在继承前贤关于商周是上古血缘组织演变重要阶段论断的基础上,总结了汉晋社会婚姻、家族和家族制度的特色,认为这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提出了汉晋是继商周之后家族演变的又一个重要转变时期的见解。作者立论的得出有两个依据,一是认为汉代婚姻家族颇有上古社会遗风,带有很多“旧”的特色,皇家贵族阶层存在着世亲婚及媵娣婚现象,民间个体小家庭及婚姻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亲